

第二章

比较优势演进与开放能力提升

开放能力是决定一国合意开放度和最优开放度的关键因素。提升开放能力不仅需要科学理念的指导、高质量制度的支持，更需要精心高效培育可开放资源。国家开放能力的提升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可开放资源的比较优势，而一国比较优势的演进空间和机遇则得益于国际开放合作。

一 比较优势深刻影响国家开放能力

现代世界经济以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①在分工视角下，国家比较优势影响国家开放能力，可从两重机制来把握：一国从事跨境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投资、金融等的的能力，以及该国制度、体制、机制等对上述开放行为的支持能力。

（一）比较优势是开放能力的基础

国家开放是全方位的，最主要的是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包括跨境生产、贸易、投资、消费、金融等领域，集中表现为货物、服务、人员、资金、技术、数据等标的物的流动和交易。这些流动和交易行为能否发生，取决于标的物是

^① Findlay, R.,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atwell, J., Milgate, M., Newman, P. (eds) *The World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91.

否具有比较优势。^①

国家比较优势既可以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等的外生比较优势，也可以是基于分工等的内生比较优势。在现实世界中，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是多种源泉的组合（见专栏2-1），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以自然资源为主的阶段、以生产资源为主的阶段、以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为主的阶段、以知识资本为主的阶段。^②

国家比较优势会随时间递增或衰减。一国发展都基于特定比较优势，跨阶段的持续发展则基于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动态转换和升级，否则就会被锁定于特定比较优势之中，掉入“比较优势陷阱”，国家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专栏2-1 比较优势理论

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专业化的益处。比如，中国“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认为，“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揭示了境内外分工及其益处的奥秘。^③

18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提出绝对优势论和比较优势论，后者的具体形式包括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论、分工经济论、制度论等，深化了人类对分工特别是经济分工的认识，从不同角度分别阐释了国家比较优势的源泉。

① 在经济学中，比较优势是特定决策者理性选择特定方案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决策者而具备的优势。国家比较优势是特定国家的竞争者生产特定商品的机会成本比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更低而具有的优势。

② 学界对国家发展阶段的划分有两类典型观点。其一，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The traditional society）、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Th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起飞（The take-off）、趋向成熟（The drive to maturity）、高额大众消费时代（The age of mass-consumption）、追求品质（The search for quality）。参见Rostow, W. W., “The Five Stages of Growth: A Summary”, I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16; Rostow, W. 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其二，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始阶段、高投资阶段、中等收入阶段、自主创新阶段。参见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

③ 《淮南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年—前122年）及其门客所著。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是西汉时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代表作包括《史记》等。参见张宇燕主编《中国对外开放4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

——绝对优势论。亚当·斯密认为，特定国家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绝对低，就具有“绝对优势”，专业化生产该产品并出口，换回自己生产成本处于绝对劣势的产品，就能获得绝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极端情形。

——技术比较优势论。大卫·李嘉图认为，特定国家若专门生产自己生产成本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生产成本相对劣势的产品，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论。伊莱·赫克歇与贝蒂·俄林认为，在生产技术相同（全球化导致国际技术扩散并趋同）时，特定国家在密集使用其相对丰富和廉价要素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如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该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了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论。保罗·克鲁格曼与海普曼·艾瀚南认为，当特定国家特定产品的生产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如果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该产品，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分工经济比较优势论。杨小凯认为，特定国家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学习，或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与知识，进而提高生产率，推动该国贸易和经济持续发展，从而获得比较优势。

——制度比较优势论。杜大伟等认为，由于制度的质量内在地决定生产率，特定国家的特定制度对不同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不同。短期内，制度通过中间投入品供需、分工程度以及工艺技术的选择等机制影响行业生产率。长期内，制度通过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机制决定技术进步的轨迹，从而形成比较优势。

（二）扩大开放能有效增强比较优势

国家比较优势要发挥作用和动态演进，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拥有新的源泉、适应新的环境，需要具备市场充分竞争、交易自由便利、市场多元共生等先决

条件，^①而这些条件需要在跨境开放中形成、获得或加速。^②

为充分发挥国家比较优势，各国不仅要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要扩大国际市场，形成更加包容开放的世界大市场，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推动市场供给和需求充分多样化。

各国通过扩大开放，识别和培育自身特定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基于国家整体的分工协作，在产业间、产业内、产品间、产品内各工序间拓展国际分工。只要各国通过开放连接而成的市场足够庞大，各国开放的领域足够宽广，多样性就更加充分，国际分工就更加精细。

二 用可开放资源加速比较优势演进

国家开放能力包括开放观、开放制度和可开放资源三部分，其中可开放资源对比较优势演进的影响，超过了开放观和开放制度。据世界银行测算，2018年117个国家共拥有可开放资源1122万亿美元（2018年不变价），比2008年增长29.7%（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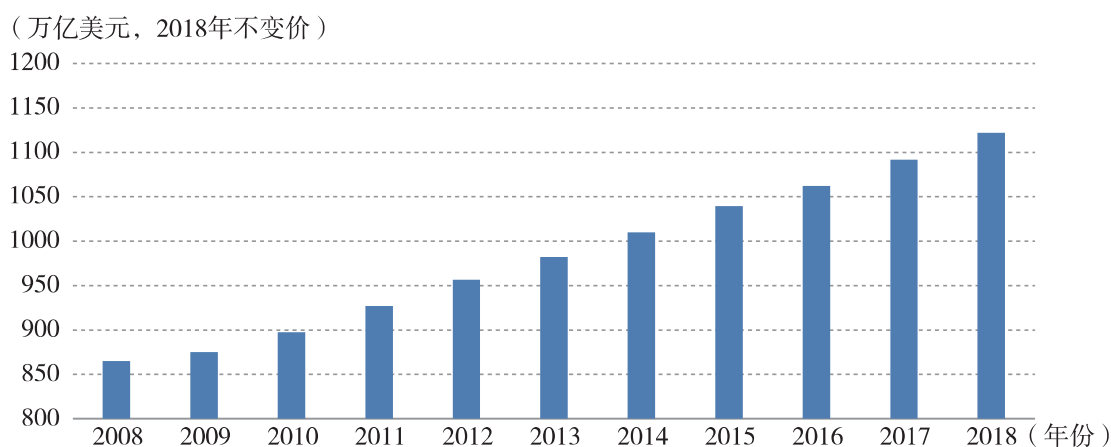


图2.1 国家可开放资源：117个国家，2008—2018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民财富账户数据库，最新数据年份为2018年。

^① Deardorff, A. V., “How Robust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Discussion Paper No. 537*, 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

^② 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

一国可开放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和对外净资产。2008—2018年，在世界可开放资源总量中，人力资源所占比重最高，约占2/3；生产资源约占三成，相当于人力资源的一半（见表2.1）。

表2.1 可开放资源类别构成：世界，2008—2018年 （单位：%）

	2008年	2012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可开放资源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其中：人力资源	62.1	62.3	63.2	63.6	63.9	64.1
生产资源	31.3	31.2	31.1	31.3	31.3	31.4
自然资源	7.0	7.2	6.2	5.6	5.2	5.0
对外净资产	-0.4	-0.7	-0.5	-0.5	-0.4	-0.5

资料来源：按世界银行国民总财富账户数据计算。

（一）人力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8年，在117个样本国家中，88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在自身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超过50%。中国为73.2%，美国为71.2%，不仅在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并且在全部样本国家中名列前茅，相应地，中美两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也较为突出（见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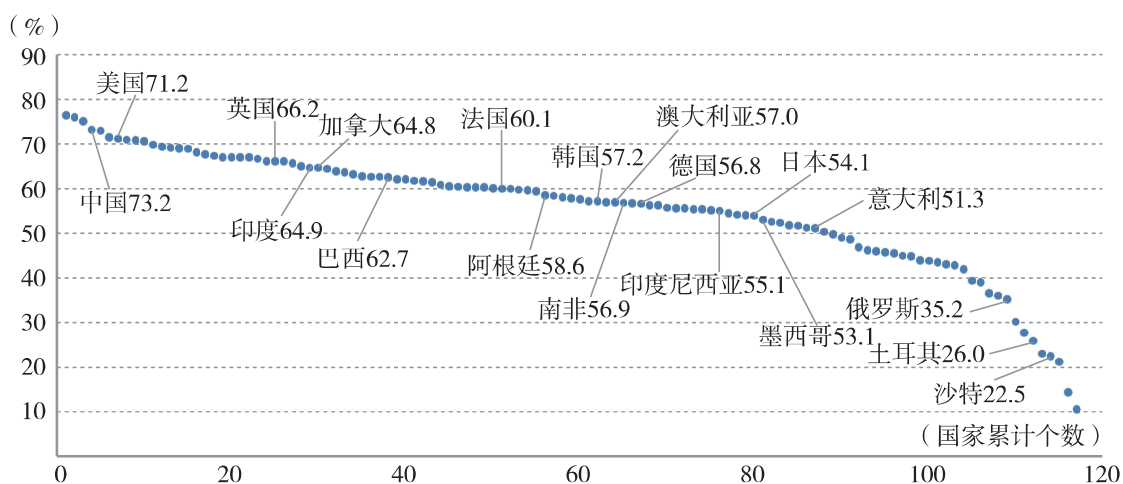


图2.2 人力资源在国家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117个国家，2018年

资料来源：按世界银行国民总财富账户数据计算。

人力资源即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一国人力资源的质与量决定了一国可承担的生产活动范围，决定了一国可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高端的能力。人力资源的可开放性一般用人口跨境流动程度来衡量，高素质境外人口的流入既可影响流入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也可优化该国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对该国比较优势的演进发挥积极影响。比如，作为知识跨境流动载体的留学生2008—2023年大量增加，推动世界入境留学生开放指数增长49.1%，提高了相关国家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

（二）生产资源是重要力量

2018年，在117个国家中，土耳其、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等30个国家的生产资源在各自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超过40%，其中有10个国家超过50%（土耳其是其中唯一的二十国集团成员）（见图2.3）。相应地，这些国家在区域性产业分工和特定领域形成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生产资源包括有形的，如机械、建筑、设备、城市土地（用于住宅和非住宅）等，以及无形的，如教育、研发等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这些资源的形成与积累既决定一国比较优势形成的基础性条件，也决定该国市场主体参与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活动的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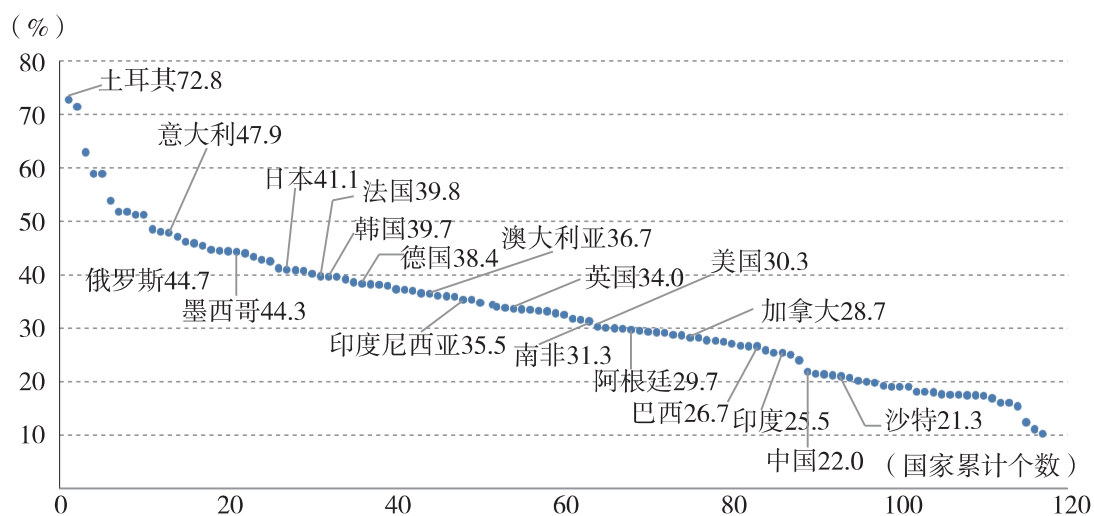


图2.3 生产资源在国家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117个国家，2018年

资料来源：按世界银行国民总财富账户数据计算。

（三）自然资源是必要支撑

2018年，在117个国家中，仅4国自然资源在各自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超过50%，10国超过40%，17国超过30%（见图2.4）。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较为单一，并未转化为充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优势。

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反映一国承载特定人口和经济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获取与利用，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前提和国家开放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所在国家的比较优势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持久性和影响力大多受限。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自然资源对比较优势演进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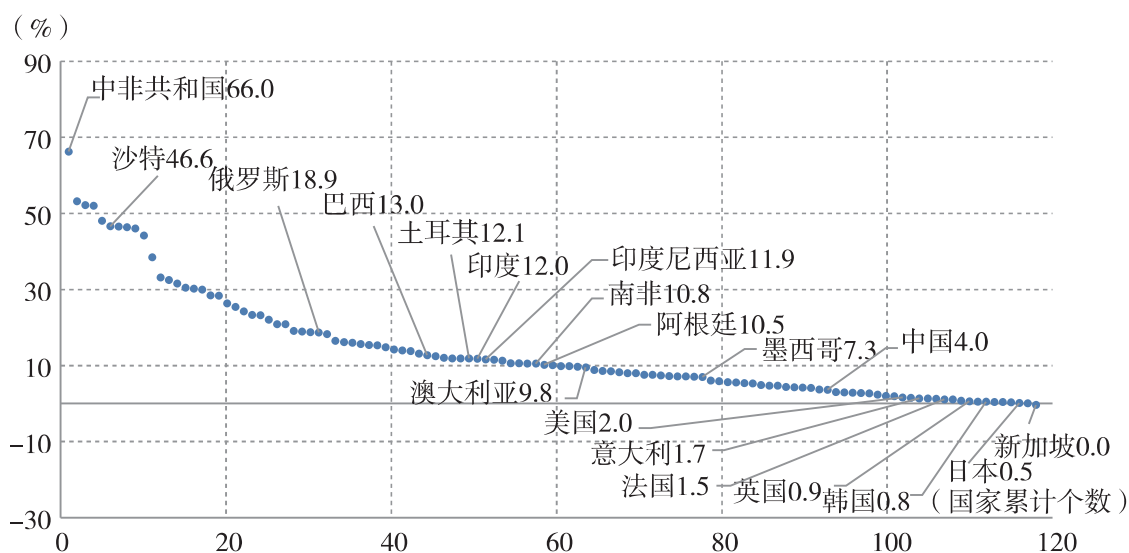


图2.4 自然资源在国家可开放资源中的占比：117个国家，2018年

资料来源：按世界银行国民总财富账户数据计算。

（四）优化可开放资源配置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开放，鼓励各层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双向跨境开放。推动跨境人才流动，开展全球招聘，选拔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建立远程工作和项目合作等的灵活用工机制。加强劳动培训包括劳动纪律培训，打造适应现代化生产要求的劳动队伍。

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充分挖掘现有生产资源潜力，更多发展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提高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高效吸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溢出的各种知识。

优化自然资源配置。开展自然资源跨境开发利用，健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合作机制。有效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促进国际联通。采取适当方式，有序推进资源配置全球化，推动国家发展主要动力从自然资源转向生产资源和人力资源，最终实现比较优势动态演进。

三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国家开放是世界开放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开放观、开放制度和可开放资源共同构成了世界开放系统。比较优势的演进同世界开放系统会相互影响，各国都需要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实现合意开放。

（一）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胸怀扩大国际合作

国家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规律揭示，在中长期内，世界开放是以国际合作而非以国际竞争为主的开放，国家开放能力需要在国际合作中提升。同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相比，所有国家组成的世界开放系统具有明显优势。在联系日益广泛紧密的世界中，不同国家之间开放的领域、交往的内容、合作的主体往往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可以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各方需秉持开放的心态，积极扩大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文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凝聚开放共识，形成开放合力，提升开放能力，实现多元化的开放发展目标。部分开放能力位居前列的国家，即使达到甚至超过合意开放度，或者在世界开放损益分布中暂时处于不利地位，仍应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开放能力，提高世界开放动态均衡水平，推动自身和其他国家实现各自的最优开放度，在更高开放水平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共建公正平等、普惠包容、合作共赢的开放世界

世界开放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为世界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了逆流，但仍然曲折向前。开放世界必须由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世界由各国人民共同组成，共商共建共享开放世界既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也是各国人民的期待。

共建开放世界需要正确开放观的引领。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有坚持公正平等、普惠包容、合作共赢，才能为世界共同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秩序，高效引领世界开放制度构建和可开放资源培育。国际组织在此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加快建立完善相关机制，加强全球化利益平衡与共享，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比较优势，增强开放能力。